



序跋精粹

# 关于《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

吴学昭

杨绛先生晚年最后做的一件她认为很必要的事，是亲手销毁了钱锺书先生和她本人的日记，以及某些亲友的书信。虽然我觉得很可惜，曾多次劝阻，但未能让她回心转意。

其后不久，我应约往谒。那天恰巧保姆小吴休息回家了，是杨先生亲自开门。经过走道时，她指指左侧的壁柜说：“一些保留的读者来信（一般均已读过）都用纸箱分盛了摆在里面，将来连同我们近年收存的报刊杂志的评论等，一同交清华档案馆保存。”

那天在她的卧室聊天谈心，杨先生想解释一下她日前销毁日记和友人书信的缘由，我没让她往下说。2013年那场关于拍卖钱杨书信的维权诉讼，经过与法学家们一年多的并肩抗争以及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虽然最终得到了圆满结局，但私人书信竟被当作商品用来交易，毕竟伤透了杨先生的心，我能理解她这样做无奈及隐衷。杨先生握紧我的手道：“谢谢理解！”

我相信杨先生自毁的日记和书信，数量也不会多。实际上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后来的社会动乱，一般人很少能完整地保存自家文稿、日记和书信。何况上海沦陷时期，一直与叔父同居的钱、杨夫妇，1949年春，闻知叔父命锺书弟

她带两子女来上海，入住其家，不得不赶紧腾出住室，临时搬入友人的空屋。由于时间仓促，搬家时未能将床下满装两人文稿、笔记、书信等物品的一只大皮箱随身带走。同年暑假，钱、杨夫妇应清华大学招聘，即携儿女匆匆北上，开始忙于新的生活。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杨先生在复旦任教的小妹杨必大病，她赴沪探望，顺道造访旧居，想将那只寄存的皮箱带回北京。当她踏进那熟悉的小小亭子间，望见床下皮箱犹在，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待打开一看，箱内空空如也，片纸只字不存。当时心中的失望和懊恨，可以想见。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钱、杨一同离开清华，调入新创立的文学研究所（先在北大办公而由中宣部领导；后归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不久，钱先生奉令借调到毛选编译委员会工作，而杨先生则“开口便错”，埋头翻译，论文发表不多。两人写信亦多是向亲长禀报生活情况和请安，旧雨新知已少有书信往来。

还记得那天杨先生说话较多，我怕她太累，便要起身告辞，请她躺下吸氧休息。杨先生却说：“不急，我还有事相托。”随即转身从橱柜里捧出一个大布袋，幽幽地说：“这都是我看了又看，实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我近来愈感衰弱，自知来日无多，已没有心力处理这些信件，现在把它们全部赠送给你，由你全权处理。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写信人中，不少你都认识，哪怕留个纪念也好！……”我听着心里很难过，又恐她过忧伤身，忙说：“我决不会辜负您的托付，至于如何妥善

处理，容我仔细研读过所有书信，与您商量后再说。”

我心情沉重地提着杨先生的大布袋回家，几乎花了两三周的时间才将袋内的信件，按照写信人所发第一封信的时间顺序整理清楚，随后开始阅读。这里面有钱（基博）老夫子满溢爱子之情的手谕，亦有长杨先生十二岁的大姐寿康讲述妹妹所不详的家史往事的长信，还有杨先生2014年生日那天，千里之外两个小孩寄来“为杨奶奶祝寿”的充满童趣的画和信。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外同辈学人的来信。从形式上看，除了法国总统、英国文化大臣等外国政要写给钱锺书先生逝世致杨绛先生的唁信系打印件外，其他书信（包括外国学者来信）多为自电邮、手机、微信流行以来，久已少见的手写书翰，带着特别的温暖和情谊。

从时间上看，绝大多数的信，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时间，一向低调沉默的钱、杨夫妇好像忽从多年噩梦中苏醒，迸发出了巨大的创造力。杨绛的《干校六记》写成后，起初怕触犯禁忌，不敢在内地出版，拿去了香港。胡乔木同志读后立即带话给文学研究所说：这本书内地也该出！在1981年欢迎赵元任的宴会上，又对钱锺书讲了他对此书的十六字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干校六记》出版后，好评如潮，英、法、俄、日译本相继出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W. J. F. 琴纳的书评，称该书是“二十世纪英语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杨绛接连写了不少散文，结果为《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又创作了

小说《洗澡》。钱锺书则发表了他采古喻今、寓讽于论，堪似人生百科全书的皇皇巨著《管锥编》。该书虽篇幅长，又系用文言写就，普通读者不多，却甚受海内外博雅明通之士青睐。哈佛大学东亚系资深讲师方志彤（Achilles Fang）先生读罢即开“管锥编”专题课，指导学生学习阅读；其弟子艾朗诺（Ronald C. Egan）后曾选译《管锥编》为英文，向西方读者荐介。

与钱、杨通信的外国学者、译者，多相识于1978年9月在意大利北部山城奥蒂赛伊（Ortisei）召开的欧洲中国语协会的第二次会议期间。钱锺书走出关闭了十年的国门，在会上生动回顾了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并介绍了我国文学的概况，他最后高呼：“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全场欢呼尖叫，掌声雷动。自此开始，充满好奇心的外国作家、学者频繁访华，交流互动，钱、杨亦成为接待这类外宾的忙人。

应该说，钱先生出访顺利，对陌生的海外学术界能应对裕如，钱、杨作品能成功推向世界，被钱锺书称为“文字骨肉”的知己好友宋淇（佛芬）先生功不可没。本书所收的宋淇来信，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细节。

宋淇为我国著名藏书大家宋春舫先生哲嗣，出身燕京、光华，上海沦陷时期与钱先生相交甚密，每周前往钱府问学，评书论文，无所不谈。据宋淇回忆：那些年，深受受益于正规教育者少，而受益于钱锺书的熏陶最多，做学问、写文章都时时不敢忘却钱先生的训海。新中国成立前夕，宋淇因所患疟疾非服进口药品难以维持生命，不得不迁居香

港。当时香港尚在英国统治下，不能与内地自由往来，但他始终心怀祖国。三十多年中，经过二十多次手术，一直坚持自修钻研他所爱好的翻译和诗词，在香港中文大学主持翻译研究中心期间创办《译丛》（Renditions）期刊与丛书，专门英译中国诗学、词学、史学及现代文学作品，宣扬汉学，不遗余力。《译丛》以它译文精正、注解详确，评书允当，受到欧美日学者的欢迎称赏。早在七十年代初，宋淇已开始筹划推动《围城》英译本在美国的出版，并亲为校阅修改译稿。1979年后钱、宋恢复联系，鱼雁往还不绝，畅谈胸臆，交流信息，评书议事，妙语如珠。

被钱先生视为“文学女儿”的德国学者 Monika Motsch（莫芝宜佳）来信频繁，谈学述著，生动幽默，充满情趣，为钱先生一家带来许多欢乐。

除此之外，这批书信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乔木同志七十岁时所写的《有所思》，老舍先生的《新年喜雪》，冰心女士的短篇和年高的苏雪林女士打听挚友杨寿康下落的来函。众多好友对杨绛痛失爱女和丈夫的慰问信，更是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读毕全部书信，联系此前所知的一些片段，对许多事顿有豁然贯通之感。我越读越投入，越读越感动，也更理解了杨绛先生何以不忍心销毁它们。这哪是些普通信件？它们承载着文化的信息，历史的证据和人间情义，是极为珍贵的文史资料！

如何处理这些书信，成了我面临的一道难题，也成了我一块心病，我只有找杨先生商量。

不幸的是，杨先生此时健康已每况愈下，不时进出医院。一天清早，我赶到协和医院，在病床前守候她睡醒。她醒来时精神不错，见到我也特别高兴，于是我们就共解难题。她问我是怎么想的，我说：“您留赠我的书信十分珍贵，您都下不了手撕掉，我更不敢也不舍丢弃。这些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宝贝，不宜由我个人私藏。我的想法是：争取在我有生之年得空时亲自将它们整理翻译注释出版，留给社会，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然后将原件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收藏。”杨先生听了，拍拍我的手背，笑说：“所见相同！可请灵犀相通。”我知道钱先生是历来反对发表其书信的，但若出版的书信集中，宋淇先生每来书垂询，钱先生却有问必答，似不太合适，故拟摘录钱先生部分复书与宋淇来信相配。对这个想法，杨先生点头同意，说她当时正因考虑到这点，特将钱先生有关复信附于宋淇书札中，以备我采选。又说：“作为我们的著作人，你有权使用钱信，不必多虑。”

难题解决，我如释重负，又觉得自己真傻——原来杨先生对此早有主意，我却冥思苦想，为难道时。我因有约在先，直到在整理、翻译、注释完《吴宓师友书札》，编著好《吴宓年谱》后，方着手整理、翻译、编辑和注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并与诸多写信人（包括已逝作者的家人）联系，获得授权同意。经过努力，总算不负杨先生所托，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整理、翻译、注释难免有不妥之处，敬祈读者不吝赐教。

2022年秋

特别恰科夫美术馆坐落在莫斯科河畔幽静的步行街深处。我来的那天，正值初雪放晴，白雪和金色落叶把暗红色的建筑和蓝天涂抹成一幅画。十九世纪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经典之作大都收藏于此。

## 大师们的肖像

艾平

我终于看见了勃拉兹作于契诃夫38岁那年的《作家契诃夫肖像》。一时间，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医生和乡村教师的全部气质——高尚、怜悯、深邃而忧郁、冷静又热忱，儒雅而平易近人，尽显于画框之内，温暖地照耀着我。

契诃夫在世上仅生存了四十四年，但是他的智慧和智慧却达到了完美。许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地方，一见到这张脸，我们都会感到熟悉和亲切。正如高尔基谈到契诃夫时所说的那样：“他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幸福及生活的意义。”

从小时候读《万卡》，担心第二天万卡的信会落到鞋匠阿利娅手里开始，到大学毕业时小果同学在哈尔滨旧书摊上找来《纪念契诃夫专刊》，尽心尽意地送给我，直至现今的书桌上上，契诃夫的作品一直陪伴着我，这种敬爱从未减退。那本《纪念契诃夫专刊》1954年出版，真丝封面已经毛边四起，线订的内页有几张已脱落，唯有封面上郭沫若的题字金光闪闪。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毫不费力就从身边的书海中把它找了出来。这本书里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青年高尔基、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员们的珍贵照片。和照片比，眼前这幅肖像画与契诃夫的相貌有些不同。然而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读者，都有默契似的接受了勃拉兹画中的这个契诃夫。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1991年排演过契诃夫的四幕生活情景剧《海鸥》，里面的人物之一、作家特里果林一望可知，是根据这幅肖像画来造型的。我和两位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一起观看了这出戏，被那场动人心魄的演出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返校的途中各自沉默。许多年以后，我还会想起剧中那只洁白的海鸥和猎枪一起出现的情景，耳边不时响起契诃夫的声音：“又少了一只美丽的，惹人喜爱的生灵，而两个傻瓜（指自己和画家列维坦），却回家去吃晚饭。”

在椴树林掩映的梅利霍沃庄园，契诃夫写出了《海鸥》《第六病室》《农民》《套中人》等名篇，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用来写作的，而是每天亲自把一座古旧的铜钟敲响，叫全家人开始干农活，然后自己去栽树和料理那些成长着的树木。1892年霍乱来临的时候，他不怕传染，重操旧业，每天给几十个农民义务诊治。他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却出钱办了三所学校，并亲自当校监和先生。在他的话剧《海鸥》上演，他已经疾病缠身的日子里，还把这部戏的收入投到了乡村学校的建设里。他太累了，不知道后来得病是不是与这段生活有关。我有时会觉得突然想起——那些洗净了脸和手，第一次坐在教室里，怯生生的大眼睛满含几代人渴望的农奴之子，许多年之后长大了，成为一个品行端正的读书人，或又被命运安排做了一个含辛茹苦的农民，是否还记得在开学的那一天，学校里那个会看病，又教他们读书，性情随和、人人都和他谈得来的先生。

我的一位同行，从俄罗斯归来，告诉我当年契诃夫创办的乡村学校的黑板上，仍然写着这样一句话：“孩子们，上学吧！你们不是早就想读书了！”这是开学的时候契诃夫对孩子们说的话。

如果不细观看，人们不会发现这幅肖像画中的契诃夫已经十分消瘦，他的前额有深深的皱纹，两只手简直像苍白的树枝，此时肺病已经潜伏在他的体内了。他戴着夹鼻眼镜，应该刚刚停止案头的工作，坐在门廊里，目光平视前方，神情无比坚毅。勃拉兹抓住了智者深思的时刻，让他的精神永远翱翔如生。

契诃夫生前就喜欢这样坐在庄园的白色门廊里欣赏周围的一切，静悄悄地思考，尤其在落日时分。屠格涅夫曾对他说过——你这个人很适合落日时分。

在展厅中，我不仅看到了列宾的多幅旷世之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托尔斯泰肖像》《伊凡雷帝杀子》《查波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王》，还有意外的惊喜——我竟然看到了克拉姆斯科依1876年所作的肖像画。

列宾有着平民背景，是一个乌克兰屯垦士兵的儿子。父亲和祖父都有过马经历，他曾跟随父辈沿着伏尔加河四处奔走，见识过库尔斯克省蒙昧的宗教行列，也很理解各种底层小人物的善良、可怜和悲哀。列宾幸运的是，他一到彼得堡就遇上了刚刚退出皇家学院的克拉姆斯科依。那时克拉姆斯科依的麾下正集结着一群思想冲破牢笼的青年画家。经过理性选择，他进入了皇家美术学院，开始了正规的基础技法训练，但他不屈于保守的教学，经常带着自己的习作，去请教克拉姆斯科依。他所画的毕业作品《伊阿亦拉女儿的复活》是按学院的命题，运用传统技法完成的，却充分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把自己童年时姐姐之死的痛苦真实地再现在画面上。

就在同时，他在彼得堡的涅瓦河上，看到那些把纤绳勒入肉肉的纤夫，为了生存听命于命运的安排，用肉体拖着沉重的货船艰难地移动脚步。那是一个腐朽的时代，一方面是权贵阶层的荒淫贪婪，一方面是底层百姓的苦难深重，他不由心潮起伏，意气难平，从此把笔触指向对现实的批判。经过三年的深入生活，列宾画出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这幅伟大的作品把历史留在了艺术的永恒中，也让我们记住了伊利亚·叶非莫维奇·列宾的二十七岁。

在观看这个展览之前，我想象中的列宾和另一位俄罗斯历史画大师苏里科夫，一定是高大健硕、臂力过人的样子，觉得只有如此才能和他们那些气势磅礴的作品相匹配。此时，如果我们不看作

品标题，无疑会把克拉姆斯科依笔下的这个清瘦甚至略显稚嫩的青年，认作契诃夫笔下的乡村教师，或者是雅罗斯科笔下的大学生。唯一不同的是，画面上那清澈如水的眼睛里，充满了一种超越了年龄的从容坚定。

克拉姆斯科依的这幅肖像画的是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列宾。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是世界美术的策源地。对俄罗斯青年来说，像列宾这样有经历又有成就的画家才可谓凤毛麟角。画面上有两处细节透露出更多的信息——洁白的衬领，细细的怀表链，说明列宾在衣着上对绅士风格的崇尚。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大都有一些西方绅士观念，诸如服务公众的道德意识，坚定内敛的性格，即使处于极端困难下也不改变的信仰和为人的谦恭温情。

列宾的一生荣誉等身，但青年时代形成的艺术主张从未改变。就连他的老师克拉姆斯科依也有被金钱打倒的经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显得怪里怪气，作画的时候也要穿着镶有绸缎襟子的长礼服，最时尚的鞋子和大红花袜，为了五千卢布，任由达官显贵们用马车拉走，去为

他们作附庸风雅的画像。在1901—1903年，列宾接受了官方价格不菲的合同，创作巨幅群像《国务会议》。即使这样，列宾依旧坚持自己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观，在他笔下，那些达官显贵并没有被美化——有的装模作样，有人妄自尊大。岁月荏苒，这幅画果真如画家所愿，成为了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

列宾也受过打压和威胁，在《伊凡雷帝杀子》展出之时，一个手持利刃的人，来到列宾肖像画廊，在这幅画上划了三条大口子。这幅画因为影射了当时沙皇统治的残暴，被特务机关禁止展出。但列宾毫无惧色，仍然以俄罗斯民族粹派反对沙皇专制的政治事件为素材，又画了《拒绝忏悔》《宣传者被捕》《意外的归来》等发人深省力作。笔触之间，他画出了革命者和艺术家的永不妥协。

三

俄罗斯巡回展览派油画大师克拉姆斯科依以肖像画的方式，为我们保留了特别恰科夫栩栩如生的形象。那是一张用尽生命中的高尚和优雅熔铸出来的脸

——棱角分明坚实，鼻梁挺直，额头饱满，硬朗的唇线显示着一种力量，宁静的双眼和粗犷的眼眉构成了脸上最传神的部分。画面上的特别恰科夫衣饰简单，没有任何装饰，你几乎看不出他穿的是西装还是俄罗斯长袍，但露出的衬衣洁白耀眼。这幅肖像画作于1876年，按照克拉姆斯科依的现实主义风格，他肯定按照生活的原样来描绘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幅肖像画是特别恰科夫的真实写照。当时特别恰科夫已经四十四岁，保持着清瘦的体态和健康的肤色，说明他长期过着俭朴有节的生活。他的眼睛充满谦逊和仁慈，在他看来那些食不果腹、浑身颜料的青年艺术家就是俄罗斯艺术的普罗米修斯。他经营企业，一旦有了收入，立马拿出来购买青年画家的作品，他说只要给自己的孩子们留下学费就可以了。列宾如是说——“特别恰科夫肩上担负了整个俄罗斯油画学派的生存重担。”

一百五十年前的俄罗斯正值黎明前最黑暗的时代，沙皇的腥腥统治有如伏尔加河纤夫肩部沉重的纤绳，压弯了俄罗斯民族的脊背。思想者以文学艺术方式所进行的反抗，则被视为异端施以封杀。一个普通商人，一个显然没有贵族背景的人物何德何能，开拓了此项功在千秋的事业！

国内出版的几种《俄罗斯美术史》，关于特别恰科夫的介绍总是寥寥数语，不过出身生卒、多年投资购买巡回展览派画家作品而已。在我非常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所发现的，也仅仅看到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传记中，曾经这样一笔带过——某位文学新人去拜望托翁时恰好“特别恰科夫带着画家列宾来为他画

像”、“和契诃夫一向交好的画家列维坦，也是特别恰科夫的好朋友”。

1892年，特别恰科夫把自己集三十六年心血收藏的、代表俄罗斯民族文化精髓的大批油画向民众公开展出，六年后，他撒手人寰。现在，他的个人收藏画廊已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国家艺术博物馆，拥有十四万余件藏品。

我凭借自己有限的俄罗斯文化知识，把特别恰科夫归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的完美“新人”之列，因为他所做的一切犹如干旱中的细雨，以温文尔雅的方式，达到了对人类的滋养和改善。

走出美术馆，不经意中看到特别恰科夫的塑像屹立在夕阳之下，他双手抱于双臂，仿佛对面有一幅刚展出的杰作，令他全神贯注地审美。塑像的颜色暖灰，右臂弯处有一片深色的剥蚀，犹如他朴素衣服上的磨痕，使塑像越发显得饱经沧桑。人们从这里匆匆走过，直奔展厅，没有谁给他留下鲜花，也没有谁在这里驻足瞻仰，这个默默于后台扛鼎俄罗斯美术辉煌的收藏家，依然把前台留给了他美好的大师们。

二十年来，我去过四次俄罗斯。对我们这代人而言，这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旅行目的地。除了在特别恰科夫美术馆流连，我还“打卡”了阿尔巴特大街、普希金文学咖啡馆、图拉省的托尔斯泰庄园、赤塔的十二月党人纪念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甚至不顾严寒，到涅瓦河畔捧起冰凉的河水，想象了半天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罗普霍夫把衣服丢在河边，假装自杀的场景……每次去都意犹未尽，还没离开就在盘算下一次要去哪里。现在想起来，真是弥足珍贵。



2024年5月15日，吴为山创作的雕塑“高尔基与鲁迅的对话”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揭幕。摄影：陈曦 戚洪岩

